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丛书

张岂之 ◎主编

夏绍熙 ◎撰

天人之际

学习出版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丛书

张岂之 ◎主编

夏绍熙 ◎撰

B2
443

天人之际

学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人之学 / 夏绍熙撰. -- 北京 : 学习出版社, 2014.1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丛书 / 张岂之主编)
ISBN 978-7-5147-0481-5

I. ①天… II. ①夏… III. ①中华文化—通俗读物
IV. ①K2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8900号

天人之学

TIANRENZHIXUE

张岂之 主编 夏绍熙 撰

责任编辑: 向 钧 关宵寅

技术编辑: 刘 硕

装帧设计: 月亮工舍

出版发行: 学习出版社

北京市崇文门外大街11号新成文化大厦B座11层(100062)

010-66063020 010-66061634 010-66061646

网 址: <http://www.xuexip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4.625

字 数: 69千字

版次印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7-0481-5

定 价: 18.00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张 岂 之



一九二七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思想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一九四六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五〇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一九五二年到西北大学任教。现任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夏文化》（季刊）主编。自著和主编的著作主要有《宋明理学史》、《中华人文精神》、《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十五讲》、《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本）等。

夏绍熙

男，云南会泽人，历史学博士（中国思想史）。现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道家思想文化。



壹

天人之学的产生与理论基础

零零壹

第一节 天人之学的产生

零零贰

第二节 天人之学的理论基础

零零柒

贰

天人之学的丰富和发展

零叁玖

第一节 天人之学的不断丰富

零肆零

第二节 天人之学的多元化发展

零捌零

叁

天人之学带来的启示

壹零玖

第一节 天人之学的思维方式

壹零玖

第二节 天人之学的当代意义

壹贰柒

壹

天人之学的产生与 理论基础



“天人之学”一词中的“天”，泛指宇宙、天地、自然万物，这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天人之学”一词中的“人”，则指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过程，人性、人生、自我、他人等都是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天人之学是研究“天”（“天道”）与“人”（“人道”）之间关系的学问，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思考和解决天人关系问题，为我们留下了既有理论深度又不同于西方哲学本体论或世界观的、有民族特色的思想财富。这些思想财富凝结在天人之学这一核心理念中，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

第一节 天人之学的产生

中国考古学研究表明，我国大约在五千多年前就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综合经济。中国有两个农业起源中心，一个是黄河流域地区以粟和黍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发源地，夏商周三代文明就诞生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另一个是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历史悠久的南方稻作农业区，孕育出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的良渚文化。这两个相邻的农业经济体系除了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发展途径外，相互之间的密切接触和交流一直是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的动力。

中华文明长期处于农业文明阶段，以农业生产力作为物质基础。农业生产力是半人工形态的生产力，受气候、土壤等自然因素影响很大，因此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很早就因农业生产进入到中华民族富有智慧的头脑中。农业生产直接取资于土地，农作物的生长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土地和庄稼都固

定不动，农民往往世代定居，很少迁移，流动性不大。农业生产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农民大多固守一地生活繁衍，农业社会中的人从小就在熟人圈子中长大，“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里我们称之为Face to face group，直接译来就是‘面对面的社群’”^①。

中华文化是从中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文化，天人之学也是从中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思想观念，是中国古代对哲学问题^②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表达和追问。

天人之学在以农业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中孕育产生，当它开始出现的时候，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并且带有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显著特征。在先民们的生活中，家族血缘的延续是至关重要的，家族的始祖占有显赫的地位，每个氏族成员都是向上联系着祖宗、向下开启子孙后代的血缘链条中的一环。早期中国对“天”的崇拜与祖先崇拜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②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对万事万物探本求源，顺着一定的思路想下去、问下去，由此产生一些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例如世界最一般的特征是什么、世界所包含的是些什么样的事物、人类在世界中的位置是什么、人类又是如何适应这个世界的等等。

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学者们研究殷商时代留下的丰富的甲骨文卜辞发现，从商王武丁时期起，殷人就相信在天上存在着一个具有人格和意志的至上神，名叫帝或上帝。在殷人心目中，这个至神上帝，主宰着大自然的风云雷雨、水涝干旱，决定着禾苗的生长、农产的收成。它高居天上，能降入城邑，成为灾害。因而兴建城邑，必先祈求上帝的许可。邻族的入侵，殷人以为是上帝命令所为。出师征伐，也必先卜问上帝是否护佑。上帝虽在天上，但能将福祥灾疾降于人间，甚至可以指挥人间的一切。人间殷王举行祀典、颁布政令，都必须揣测上帝的意志而为之。居于天的上帝有这样的全能和尊严，只有人间的殷王才能与它接近。殷人以为殷王先祖死后可以配天，在上帝左右，称为王帝，也能降下祸福，几乎同上帝一样。由此可知，殷商时期的天人观念笼罩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其实，上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只不过是统治人间的帝王的反映。

随着历史的变迁，公元前11世纪，周人伐灭殷商，建立西周。为维持统治，周人必须对这一巨

变作出思想观念上的合理解释，才能让殷商遗民心服口服。于是，以“天”为基础的天命论成了周人说明自身政权合理性的重要论据。在周人心目中，

“天”是至高无上的神秘力量，与殷人的上帝相比，“天”的人格神色彩淡化了，自然性的意义加强了。“天”在周人那里具有高高在上，明察人间一切的最高神的性能。“天”不仅有自然性的一面，也有道德性的一面。周人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①，上天不会无理由地亲近任何人，而是有选择地帮助有德行的人。

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天”是至高无上的，它高踞太空，超越上帝。天命是天神向天庭和上帝发布的命令。“天命靡常”，惟有德者居之。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明确地刻着：“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王作邦。”在周人看来，殷人的上帝因其人间子孙的暴虐而不合天意了，至上的天神命令在天庭改朝换代，然后再把这场革命移植到人间。于是天庭里的周文王接受天命，取代殷人的上帝，他在人间的儿子周武王在天命护佑下顺理

^①《左传·僖公五年》。

成章地灭殷商，建立西周。^①

周人不仅重视高高在上的“天”，而且也重视“人”。西周取代殷商，成为新的胜利者。但从周初的文献来看，周人并没有胜利者的趾高气扬，而是表现得谨慎小心、踏实努力。他们因商周之际的历史剧变而深思熟虑，认识到天命的改易、事情的吉凶成败都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为政者必须随时检点自身的行为，才不至于失去天命。周公旦把为政比作“若游大川”^②、“若涉渊水”^③，说明要治理好国家，需要统治者顺从天意，小心谨慎、认真办事。因此，周人提出了“敬德”、“明德”等观念，认为统治者在行事过程中要敬天、孝祖、保民，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天命不坠，治理好社会，为民众解决困难。他们强调人不要只把水当作镜子来观察自己，还应当把民众当作镜子来观察自己。^④这是提醒统治者不断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顺应上天爱护民众的要求。

商周时期，随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

① 参见刘雨：《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4 页。

② 《尚书·君奭》。

③ 《尚书·大诰》。

④ 参见《尚书·酒诰》。

明的发展，天人观念不断变化。商人认为天命会永远属于自己的列祖列宗，不用为暴虐的统治担心，最终因此失去政权。周灭商后，对商周之际的历史剧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强调“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认为只有顺应天命才能长治久安，天人关系成为处理其他政治关系的基础。其中的保民思想包含着人文精神。到春秋战国时期，当人们冲破宗教思想的束缚，用理性思维探索天人关系的时候，天人之学就以哲理的形式融入中华文化的长河中，在深刻性和普遍性上拓展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第二节 天人之学的理论基础

西周的盛世，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大约从周夷王开始，便逐渐在内忧外患中衰落，天命论也开始动摇。“天”不断遭到怀疑甚至否定，“昊天不慵，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①。上天不公平呀，降下这么大的祸乱。上天不仁爱呀，降下这

^①《诗经·小雅·节南山》。

么大的祸患。“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①从前赏善罚淫的“天”，现在却福恶祸善，青睐骄横得意的人，对勤劳善良的人不理不睬。在怀疑、怨愤和苦难中，人们渐渐意识到，天与人的关系不只是简单地赏善罚恶。天有自身运行的法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进入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西周的天命观念虽然仍具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有许多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天命观念对“天”的解释，他们开始将天道、人道进行区别，抛开宗教观念，给出通过理性思考得来的解答。在一个民族的思想历史中，这种转变是值得注意的。它意味着哲学意识的诞生，人们开始以理性代替幻想，用智慧代替想象。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观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具有原创性的文化，为天人之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鲁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周内史叔兴到宋国，他解释当时天上坠落五块石头、六只鸛鸟退着飞经过宋国国都这两种罕见的自然现象时说：

^①《诗经·小雅·巷伯》。

这是有关阴阳的事情，并不与人事吉凶有关。吉凶由人的行为所决定。他把上天发生的变化理解为“阴阳之事”，把人类的吉凶祸福理解为人们自身行为招致的结果。春秋末年，郑国政治家子产明确地说：天道玄远，人道切近，两不相关，怎能通过占卜祈祷等迷信方式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呢？春秋时期，人们的思想已有这样的趋势，将“天”与“人”分开来，进行独立的探讨，然后再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思维方式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已经较为常见了。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学者们认为是战国中晚期的作品，其中一组名为《穷达以时》的竹简上明确写道：“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天与人是有分别的，要对此有深入地体察才能知道二者的密切关系。可见，摆脱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天命论，对天人之学进行哲理性探究的重要一步是对“天”与“人”进行独立深入的研究。

春秋时期在思想上出现的重人事轻天道变化，首先见于兵家（军事家）的著作。在春秋末期吴国

将军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首次提出对天人关系要进行理性思考。《孙子兵法·计》说要从五个方面来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帅，五是法制。在这“五事”之中，天时是讲昼夜、阴晴、严寒、酷暑等气候季节情况；地利是讲高山洼地、路途远近、险要平坦、广阔狭窄、死地生地等地形条件（这些属于“天”的范畴，即战争所面对的客观情势）；而政治是指要使民众和君主愿望一致、上下同心；将帅是指为将者要具备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威严等条件；法制是指军队的组织、编制、管理要严格执行。这些都属于“人”的范畴，涉及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性的充分发挥。

在孙武看来，只有对“天”的范畴与“人”的范畴有明确的认识，把战争的客观法则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掌握战争的主动，从而战胜敌人。

孙武从军事理论的角度对“人”的重视还体现在他提出战争胜败的大局可以通过理智的分析判断得出，他用“知”字来概括人的理性能力。《孙

子兵法·谋攻》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地形》一篇也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可见孙子认为战争的指挥者只有对彼己双方的情况、天时地利等影响战争的因素有清晰认识，才能作出正确选择，制定相应的行动方案。

孙子重视天人关系的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理论的范围。史书记载，越王勾践的大夫范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由于兼顾天时、地利、人和三者而取得成功。战国中期儒学代表孟子认为，天时、地利与人和三者缺一不可，而“人和”最为重要。^①战国时期的兵书《尉缭子》也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②。战国末道家的《十大经》（古佚书）把知人事作为知天时、地利的中心环节。可见，我国古代重人事轻天道的理论与战争实践关系密切，不是思想家们空想的产物。

春秋战国时期，深究天人之学，构筑理论体

① 参见《孟子·公孙丑下》。

② 《尉缭子·战威篇》。